

中印对话

2018 年第 6 期（总第 12 期）

p.20 印中经济改革比较

p.46 以务实态度推进中印合作



改革开放与中国奇迹

ISSN 2096-2592



国内零售价：10 元 / India ₹ 100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塞罕坝

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

半个多世纪，三代人耕耘。

沙地变林海，荒原成绿洲。

寒来暑往，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覆盖率

已达80%。

栽种树木按二米株距排开，

可绕地球赤道二圈。



目录

大事记 / p.02

开篇辞 改革开放与中国奇迹 / p.04
敞开通往繁荣的大门 / p.06

评论 平衡外交再现G20, 印度能坚持多久? / p.10
G20的“无用之用” / p.12
2019, 速度与质量并重 / p.14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 p.15

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成就与经验

16



印中经济改革比较 / p.20
中印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 / p.23
邓小平: 印中关系奠基人 / p.26

趋势 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 p.30
长三角一体化: 破壁与互联 / p.32
“一带一路”: 重构与反哺全球化 / p.34
金融: 如何更好地开放? / p.36

案例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 / p.38
社会治理之路: 变革与发展 / p.40
对印投资: 从竞争到合作 / p.42

论辩 以务实态度推进中印合作 / p.46
从发展指数看中印 / p.49

数据 改革开放40年大事纵览 / p.52

青年声音 新·媒体 新·潮流 / p.58

专栏 “非异化”生活的可能性 / p.62

阅读 崛起在世界的地平线 / p.64

中印对话

主管: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主办、出版: 人民画报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箱: contact@chinaindialogue.com

社长: 于涛
编委会:
于涛、李霞、贺鹏、鲍林富、于佳、闫颖
总编辑: 李霞
编辑部主任: 温志宏、乔振祺
翻译定稿: 徐明强、刘海东
语言顾问: Scott Huntsman
审校: 徐欣
编辑、翻译:
王舒雅、刘海东、许舒园、
李艺琦、李卓希、Mithila Phadke、
周昕、胡周萌、赵月、殷星、龚海莹
流程统筹: 李艺琦
设计: Alinea Productions

邮购收款人: 人民画报社出版发行部
电话: +86-10-68412660
+86-10-68414797
法律顾问: 岳成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刊号: ISSN 2096-2592
CN10-1432/D
邮发代号: 82-209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第399信箱, 100048
电话: +86-10-68413849
+86-10-68412166
广告许可证号: 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199号
出版时间: 2018年12月
定价: 10元

《中印对话》顾问委员会(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为公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顾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
马加力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艾嫫伽 (Alka Acharya)
印度中国研究所前所长
孙士海 原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孙玉玺 前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
前中国驻印度大使
阮瑞山 (T. C. A. Rangachari)
印度辩喜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前印度驻外大使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
研究中心教授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杨满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亚中心
印地语广播部主任
林民旺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塔伦·维杰 (Tarun Vijay)
印度议会印中友好小组主席
前印度联邦院议员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中印对话

2018年第6期(总第12期)

www.chinaindialogue.com

中印举行第九次防务安全磋商

2018年11月13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邵元明副参谋长与印度国防秘书米特拉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第九次防务安全磋商。期间，双方深入讨论了中印两国两军关系、边境管控与边防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等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要坚持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坚持“稳定边防、增进互信、发展友谊、深化合作”的原则，推动两军关系向前发展，确保把两国领导人在涉边问题上的有关共识传导落实到职能部门和一线部队，确保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一次会晤取得重要共识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一次会晤于2018年11月24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共识。会晤基调积极，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

双方表示，将遵照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就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发展中印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两国领导人政治引领下，

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福祉出发，不断推进特代会晤谈判进程，争取早日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习近平主席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2018年1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同总理先生今年第四次会晤。我们就发展中印关系达成的许多重要共识正在得到扎实落实，中印关系稳步提升。中印关系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不仅为中印各自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也给当前深刻变动的国际形势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我愿同总理先生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中印关系更快更好更稳向前发展。

莫迪表示，今年以来，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并有力推动了印中关系发展。印度支持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举措对促进全球贸易平衡增长非常重要。感谢中方及时向印方提供水文讯息，这对印方防洪抗灾非常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增进互信，发挥边界特代会晤机制作用，维护好两国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推进各种机制性对话，深化贸易、医药、通信、旅游、执法安全等交流合作，加强多边事务沟通协调。我愿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努力，将印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在中国成都举行

“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于2018年12月11日至2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中印双方参训官兵以“中印两国联合打击国际恐怖组织”为背景，按照适应性训练、混编同训和综合演练三个阶段，共同完成“城镇条件下街区联合反恐作战”课题训练。联训期间，双方参训官兵混编成为A、B两个连队，共同生活、共同训练，互相学习彼此的战术技能、训练方法和指挥程序。

2007年至今，中印双方共举行了七次“携手”系列反恐联合训练，有效拓展了两军交流合作的领域层次，表明了两国合力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坚定决心，彰显了两国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共创和谐发展的良好意愿。

第三届中印技术转移、创新与投资合作大会在新德里举行

2018年12月18日至19日，第三届中印技术转移、创新与投资合作大会在新德里召开。来自中印两国的协会、企业、研究机构代表150多人与会。中印代表就现代农业、生物医药、新能源、物联网、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等话题进行广泛交流对接，达成系列合作意向。

中印举行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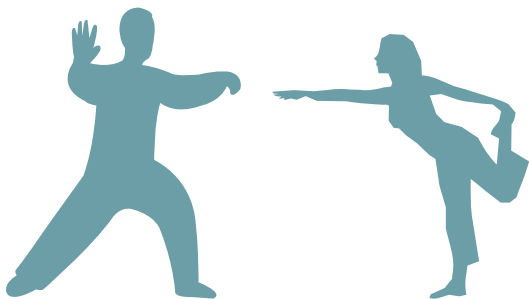
2018年12月21日，中国—印度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共同主持。

王毅和斯瓦拉杰首先分别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向会议发来的贺信。

王毅表示，建立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今天我们正式启动这一机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步骤，是推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东方文明复兴的重要平台，将有助于巩固双边关系民意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按照两国领导人在贺信中提出的方向，发展好、利用好这一机制，促进民心相通，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斯瓦拉杰表示，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会晤时一致同意建立两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展现了远见卓识。印中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启动印中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必将为两国人文交往提供新平台，为两国关系与合作提供新动力。首次会议的圆满成功，也将把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使人文交流纽带成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

会上，中印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文化、媒体、影视、博物馆、体育、青年、旅游、地方、传统医药与瑜伽、教育与智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改革开放与中国奇迹

文 / 林毅夫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习主席能作出这样的表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的成绩。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1978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换言之，9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跟国际经济是不相关的。然而，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了9.5%。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国家在人口庞大、基础薄弱的背景下，实现了如此高速度和长时间的增长。因此，将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称为“中国奇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表述。

上世纪80、90年代，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同样的改革开放给绝大多数国家带来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甚至有经济学家称那段时间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然而，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为什么中国

的经济发展却实现了高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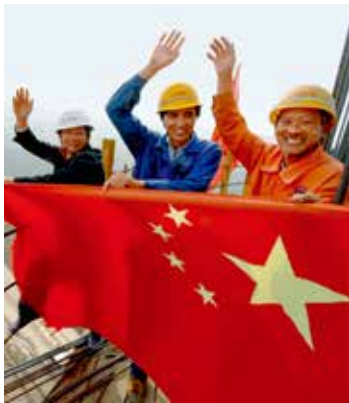
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发挥了后来者优势和采取了适应自身情况的转型思路。就后来者优势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谓技术创新指的是在下阶段生产时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产业升级指的是进入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因此，如果把其他国家用过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转移过来，只要比现有的技术好，附加价值比现在产业的附加价值高，就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经济学上把这种可能性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变革图强勇于创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步成熟壮大。图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作业区。（新华社）

做“后来者优势”。在经济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实现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因为转型思路的不同，中国经济有了与其他转型中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流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



2014年3月11日，经过四年的艰苦工作，晋陕黄河特大桥建成完工。（IC）

所以国家改革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型，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政府的所有干预、保护、补贴取消掉。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一大批规模大、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如果采用休克疗法，把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在倒闭的同时，将造成大量失业以及社会动荡。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对大型国企在转型期进行必要保护；另一方面放开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让其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中国逐渐从资本短缺变为资本丰富，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许多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拥有了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

力。在这样的变化下，才有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总结改革开放40年，可以得出以下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第一，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是8100多美元，而美国约是57000美元。这代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还有很多后来者优势可以挖掘。第二，中国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中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教科书理论。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中国经济发展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还可以保持相对较快的速度，到2035年，能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中国能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中华民族有伟大复兴的梦想，每个发展中国家也都有成为现代化、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的梦想。相比起发达国家，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林毅夫为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敞开通往繁荣的大门

文 / Sreemati Chakrabarti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印度通过经济自由化，两国通过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都走向了经济发展和繁荣。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巨变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当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当时，观察家们都认为这仅仅是中国国内政策的范式转换，没人预料到这个国家将因此发生彻底改变。

“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让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一样的高速发展与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2年的近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10%，人均国民收入从300美元飙升至8000美元。改革开放开始仅仅10年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有了显著提高。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让农民成为了主要受益者。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能够在开放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从而增加收入。工业化也因此得到了较大

提升。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开始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制造业和工业基地、促进贸易和旅游业发展、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亿中国人在短短40年内便摆脱了贫困。改革孕育了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高校数量攀升，学科专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通过阅读当日报纸了解相关新闻。（CFB）

业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重现活力的明证。大笔国家拨款流向相关高校，用以开展世界一流的研究。这样的做法继而推动了创新，中外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之间开展的学者交流以及联合研究项目为中国的科学进步增添了新动力。许多发明获得了专利，不少中国科学家和研究者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此外，研究机构和智库得以建立，这不但推动了其自身的研究议程，还促进了其与外国同行的面对面交流。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的贸易额与外国直接投资都显著增长。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逐年上升，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在内的大量跨国企业都进入了中国。中国很快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旅游业发展迅速，入境及出境旅客数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业发展

迅速，新建公寓楼群遍布城市和农村。当然，关于中国高速发展的事例还有很多。

然而，这样的大幅增长和快速发展也带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贪污腐败、城乡差距等等。众所周知，任何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都会导致发展差异。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大众也都了然于胸，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所有问题，但中国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和政策，将不良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印度，过去几十年里，它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991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政府管控从多个领域退出，私营部门和私有企业充分利用了自由化体制。宽松的经济环境和稳步发展的计算机软件行业使得印

度经济得以全面发展和创新，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中小微企业大量涌现，成为生产和就业的重要载体，大量财富和工作岗位也由此产生。此外，这些措施也极大地推动了印度贸易的发展。印度国民购买力增强，这相应地又惠及了各个行业。外国直接投资也呈现指数级增长，跨国公司在印度各地建立了工厂和直销店，为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提供了就业岗位。

因为经济转型，社会对工程师、软件人才、律师以及会计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高等教育部门对此作出了回应。此前，印度的大学几乎都是公立的，难以满足社会日渐增长的人才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建立了一些私立大学、工程学院和技术学院。高等教育的私有化主要是用以缓解公立大学不足的压力。然而，公立大学尽管数量增长缓慢，却开辟了不少新专业和学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些政策帮助印度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和中国一样，印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给印度带来了更多的公路、大桥、机场和码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自由化政策让印度计算机软件行业迅速发展，印度开始作为IT强国崛起。全球不但对印度软件产品需求巨大，对印度计算机人才和工程师也青睐有加。这种趋势增加了印度与世界的交流，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来的负面影响与中国有类似

之处，其中包括城乡差距、环境恶化以及贪污腐败等。但是，印度的贫困人口数量却要比中国大得多。发展不平衡导致了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的活跃，其活动范围涉及全印领土近三分之一。此外，因为建设工程项目而损毁森林，导致很多部落社区不得不搬离家园。

互补合作之路

印度的经济改革几乎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同时启动。尽管印度在之后数年都保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但与中国的差距却在逐年增大。印度的“东望”政策（现在改为“东进”政策）为其与中国和其他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印中贸易额大幅攀升，短短十年中，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量中国商品开始出现在印度市场上。

中国出口到印度的产品最初大多是廉价消费品。但最近十年里，包括空调、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在内的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开始进入印度市场。最令人瞩目的产品就是手机。目前，



印度的茶叶产业规模为全球第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产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的红茶更是享誉世界。图为大吉岭地区的茶叶生产企业。（VCG）

中国手机在印度市场的份额正与日俱增。尽管当下韩国占据了印度电子产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企业将成为韩国企业在印度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对手。

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来自中国的制成品因为价格实惠，在印度市场上一直广受欢迎。但是，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大多是原料和矿物，印度商品在中国市场也反响平平。

印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存在已超过十年，印度想进入中国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医药以及农产品领域的愿望还未实现。但是印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也许可以通过增加双边投资来解决。近些年，两国双边投资趋势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印中两国在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彼此互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惠及了印度很多中小企业和商户。印度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做小本生意的人，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灰色行业从业人员占全印雇佣人员的80%。而来自印度的原料和矿物，也切实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此外，印中两国在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方面的合作，是最为互利共赢的措施。过去20年，有大量印度学生前往中国学医。两国的科研交流项目有所增长，在研究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如果携手合作，印中两国有望在科技创新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学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在诸如语言、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印中之间的交换生项目增长速度虽

然不快，却也在稳步发展。阿育吠陀疗法和瑜伽现在已被很多中国人熟识，宝莱坞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这不仅为印度电影业带来了票房，更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我认为当下很多中国人都有了了解印度的愿望。

边境贸易温和增长，让两国边境附近的居民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水平。目前，印中仅开通了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在夏季进行边境贸易。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实现其他地区边贸开放。边境贸易会极大惠及较为贫困的当地人民。不要忘记，在边境还不存在的年代里，印中之间的贸易一度繁荣异常，尤其是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贸易。边境贸易可以极大地减少运输费用，作为邻国的印中两国都可以从中受益。

对印中两国来说，安全考量始终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问题。但即使如此，两国在彼此的经济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和印度经济改革的积极影响之一，便是在两国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通过将自身技能、创业举措与全球目标结合起来，为两国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向世界进一步打开了各自的大门。几十年来，两国持续发展，各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合作交流持续加强。随着近年来双方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积极探索新的交流，印中两国的发展有望迎来崭新的篇章。

本文作者 Sreemati Chakrabarti 为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席。



爱护树木 保护树木

关爱地球之肺 净享清新空气

平衡外交再现 G20， 印度能坚持多久？

文 / 林民旺

一方面要加强中俄印合作机制，一方面要与美日一起走向“成功”，印度在 G20 峰会期间彰显的平衡外交正在受到激烈地缘竞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20应运而生，同舟共济地对抗全球经济风险成为当时20国的首要目标。然而十年后，随着金融危机风险的着陆，G20框架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开始凸显并加剧。因此，国际各界对于2018年阿根廷G20峰会的关注点更多聚焦在主要大国领导人之间会如何互动，各界对于双边和多边会晤的重视程度似乎已经超越了对峰会成果的期许。

对印度而言，G20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正如印度前总理辛格在参加首次G20峰会时感慨“我们终于坐上主桌”一样，印度将其看作是自身崛起和国际地位的象征。此次借G20峰会之机，印度总理莫迪同各国领导人陆续会晤，其中，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都备受关注。

在同习近平主席的双边会晤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武汉会晤是中印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要将武汉会晤的精神具体化，进一步提升两国互信和友谊。莫迪称，很期待明年能在印度接待习近平主席，继续双方的非正式会晤机制。而在多边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两国领导人都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贸易面临的挑战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表示担忧，呼吁金砖国家要增进团结合作，共同发出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反对保护主义的声音，也提出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问题上，各方应继续寻

求在G20峰会中共同发声。

除了双边和金砖会晤，更具突破性的是中印俄三边会晤机制的形成。在此次G20峰会期间，中俄印领导人举行了首次三国非正式会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就曾提议建立中俄印“战略三角”。2002年9月，中俄印三国外长在联合国第57次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后来逐渐形成了三国外长年度会晤机制。但是，三国领导人层面的会晤机制却一直未曾出现。然而，随着2017年印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作为欧亚大陆的三个大国，明显加强了彼此间的战略协作。正是在此背景下，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举行了首次会晤，一致同意加强三方协调，凝聚三方共识，增进三



当地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摄影 /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

方合作，并且同意要进一步加强中俄印合作机制。

作为对冲和平衡，印度同样参加了美日印三国首次在多边会议中举行的领导人会晤，这也是其三国外长会晤机制的升级版。莫迪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中称：“美国和日本都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两国领导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日本、美国和印度三国合写的减缩词是 JAI，而

JAI 在印度则是成功的意思。”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也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表示：“JAI 会议要致力于民主价值。三国领导人关于印太、海上及互联互通问题交换了意见。”不过，虽然三国都认可在多边会议中举行领导人三边会晤的重要性，但还没有承诺这种会晤将形成定期化机制。

不难看出，印度平衡外交的特点在 G20 峰会上再次彰显。

印度骄傲于自己的灵活身段，一方面加强同欧亚大陆的合作，一方面加强同海上强国的合作。但随着愈演愈烈的地缘竞争，印度这一平衡外交的策略不知能否继续延续下去。■

本文作者林民旺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G20 的“无用之用”

文 / 叶玉

为不同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之间达成某种“大交易”提供一个开放和柔性的平台，这正是当今 G20 的“大用”所在。

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当前，全球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宣布“退群”，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价值遭受严重质疑。在此背景下，即便G20峰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产出的85%、国际贸易的75%、全球投资的80%和人口的66%，它也被质疑是一个热闹却无用的“清淡馆”。人们更多地关注G20主场讨论之外临时性的双边外交和热点问题，亦不足为奇。

G20到底有没有用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人们对G20在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携手应对危机、加强全球银行业监管和打击避税天堂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效是有高度共识的。当前G20不受追捧，或许恰恰是因为世界不再面临十年前那样的全球性危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有望达到3.7%，实际上为全球经济复苏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全球债务攀升至历史新

高，今年G20的东道国阿根廷自身也陷入经济动荡，正在接受IMF的紧急纾困，全球的贸易冲突更是愈演愈烈，这些均



构成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

着眼未来，应对危机或许仍将是G20最突出的功能，但绝不应该是其唯一的功能。很多观点认为，G20之所以变得“无用”，是因为其议程过度膨胀，导致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恰恰是G20应该发挥的“大用”。

当前，反全球化威胁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仅靠多边主义支持者的宣誓是不够的。这就需要G20发挥其全球治理网络中心的独特作用，在汇聚和动员全球范围内多边主

义支持力量的同时，更加开放包容，为弱势群体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更直接有效的通道，促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关切和立场的大碰撞，真正为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发展凝聚最广泛的共识。这也正是上世纪末以来“全球治理”思潮兴起的应有之义。

就这个意义而言，G20议程的扩大背后是更深层次的需求，即为创新、增长、效率与公平、绿色、包容等具有张力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之间达成某种“大交易”提供一个开放和柔性的平台，缓解单边主

义和极端主义的破坏力。

这一进程艰巨而漫长，但G20最有可能提供这样的便利。一是因为其代表性。昔日代表发达经济体利益的七国集团如今已成为G20框架下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等强国合作机制等相提并论的次级集团。二是因为其立体性和机制性。G20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跨政府、多层次的国际交流机制，背后更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能源署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强大智力支撑。三是因为其开放性。G20不仅是其20个成员方政府之间的对话平台，还形成了面向非成员方及其他地区性组织、商界、智库、民间组织、青年和女性等各类社会群体的广泛对话机制。

当前，G20没有也不应完全被贸易战绑架，而需要人们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充足的耐心去看待。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成为了今年G20的一大亮点，各方就科技创新和自动化给人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讨论，这有利于塑造中长期全球经济包容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面临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中国将与各国一道坦诚、务实交流，逐步将共同的愿景转变为现实。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3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会领导人合影。（摄影/新华社记者李涛）



本文作者叶玉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9，速度与质量并重

文 / 黄汉权

中国将更加注重通过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变过去依赖投资拉动、要素投入和牺牲环境的增速模式。

2018年,尽管面临不太确定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中国经济仍然实现平稳增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7%,预计全年为6.6%。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将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6.2%-6.5%之间,比2018年小幅回落。

从消费来看,虽然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下降,但明年有望止跌转稳。一方面,中国拥有四亿中等收入群体和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比较强劲,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万亿元,而且年均增长接近10%。另一方面,2018年10月,中国政府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明年也将出台进一步给企业实质性降税减费和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

增长具有较强的支撑。

从投资来看,随着“六稳”政策的实施,投资有望保持平稳态势。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有三大类别,分别是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者合计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80%以上。目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为2.6%,还有提升的空间。2019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对农业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节能环保、生态文明建设、民生建设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资,这意味着基建投资将保持平稳增长。

从出口来看,虽然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但中国出口仍将保持正增长。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弱,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大。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7%,比2018年4月发布的预期低0.2%。同时,受2018年以来美国频繁挑起的国际经贸摩擦影响,全球贸易商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以上因素叠加将使中国出口受到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没有改变,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强,而且中美正在就解决贸易摩擦积极磋商,并有可能达成和解协议,这意味着在2019年,中国外贸增长虽有下行压力,但仍将可以保持个位数增长。

和速度相比,中国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质量。中国将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注重通过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变过去依赖投资拉动、要素投入和牺牲环境的增速模式。同时,中国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出清,采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水平。

本文作者黄汉权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文 / 王晓毅

如何实现高质量脱贫、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以及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这是未来两年中国的主要脱贫任务。

到2020年实现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即将进入最后两年期限。随着越来越多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县、贫困村“摘帽”，精准扶贫的任务已逐渐转向保障高质量脱贫、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从2018年开始，精准扶贫进入贫困村和贫困户大量“摘帽”退出时期。尽管贫困退出机制包括了严格的退出验收环节，不论是贫困户或贫困村、贫困县，都要经过严格评估以保障脱贫的质量，从而实现高质量脱贫，但是在退出过程中，仍然有可能出现假脱贫或数字脱贫的现象，即使是真脱贫也可能会返贫。

为了防止出现假脱贫，扶贫退出采取了严格的责任制度，各级政府严格执行退出验收的标准，与此同时，社会监督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也大大减少了假脱贫现象发生。为了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贫困人口脱贫后扶持政策不变，而且要保证贫困户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平均水平。

贫困退出机制不仅意味着贫困户、贫困村和贫困县的退出，更意味着对扶贫质量的系统检查和推进。

自2013年中国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留给未来两年要解决的贫困人口不会超过2000万。尽管目前所剩余的贫困人口数量很少，但是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即中国政府提到的“三州三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以及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和甘肃临夏州。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多是高寒山区或干旱地区，自然资源匮乏，产业发展难度很大。同时，这些地方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受教育水平较低，长期贫困不仅导致一些贫困群体缺少脱贫的能力，更严重的是，一些贫困人群缺乏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信心。

因此，未来两年中国扶贫重点将转移到深度贫困地区，这不仅需要增加扶贫的资源，而且需要不断创新扶贫机制。中国政府新增扶贫资源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生态扶贫、资产收益扶贫

和就业扶贫等新方式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尽管精准扶贫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大部分贫困户在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以后，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继精准扶贫以后，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意在推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实现有机衔接。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要延续产业扶贫的政策，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同时也要继续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将部分有效机制制度化的战略举措。

未来两年里，贫困退出、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和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这三个方面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更协调和更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王晓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成就与经验

文 / 胡必亮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重要成就与基本经验，将为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启迪。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CFB）

40年前，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天，我们应对这期间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经验进行总结，为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启迪。

成就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成就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与经济实力两条主线上。

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中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建国后不久按照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构建的经济发展模式，到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再到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几十年的反复探索，中国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开放到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第三，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打破，城乡一体化基本框架逐渐显现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第四，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并取得良好效果。目前，中国有近8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

第五，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8%跃升到2017年底的59%，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改革开放让中国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图为1984年，北京昌平区养鸡专业户孙桂英一家在自购的小轿车前合影，她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购买轿车的农民。（摄影/李晔/CFB）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中）大胆改革，打造出海盐县第一个产值超千万元人民币的企业，被誉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行者”。图为1984年，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剪裁方案。（摄影/新华社记者戴纪明）



1990年，深圳，冲进交易所购买股票的人们。万人争购股票的场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和人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摄影/张新民/CFB）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讲话，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图为1992年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上，邓小平巨幅画像前行人如织。（摄影/安哥/CFB）



1997年7月1日零时，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冉冉升起，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CFB）



2002年12月27日，山东济平，为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南水北调”工程举行开工典礼。（摄影/新华社记者吴增祥）

和能力、能源利用效率、社会治理能力等都不断提高。

经济实力有五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1500亿美元，排世界第11位，2017年GDP总量为13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二。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197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600亿美元，现在近4万亿美元。三是货物贸易总额全球第一。1978年，中国货物贸易总值为210亿美元，2017年达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四是外汇储备全球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7亿美元，2017年年底超过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五是粮食安全有保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粮食总产量仅3亿多吨，人均300公斤，2017年已超过6亿吨，人均450公斤。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积累了以下十个最重要的经验：首先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演化成为促进国家积极发展的力量；二是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兼备中国特色；三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四是推进了融入全球的开放。中国开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年建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2001年加入WTO实现中国贸易与投资规则与世界的对接，2013年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更好发展，2013年秋提出了引领主动开放期的“一带一路”倡议；五是坚持把经济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六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七是积极促进和保护竞争；八是优先发展



由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三峡工程是治理长江和开发水资源的重大工程，是中国治水史上的创举。图为2004年5月，游客在远眺三峡大坝。（新华社）

教育事业；九是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十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个重要经验，即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先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经试验后发现粮食产量有大

幅提高，就出台政策文件把试验成果规范化、法制化。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改革、创办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等，都是这样慢慢试验后逐步推开的。

重要世界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开始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最近几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每年平均贡献率都十分稳定地保持在30%以上。

具体而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以来，已经投资了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塔吉克斯坦修铁路，在乌兹别克斯坦修隧道，在巴基斯坦修电站，在老挝修铁路，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建高铁，在缅甸和斯里兰卡建港口，在白俄罗斯建工业园，在非洲大规模修公路和铁路等。这些

都为改善全球基础设施条件，为构建更加联通的世界直接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如，中国每年从世界各国进口商品约2万亿美元，进口服务约5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巨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引进的外资，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本净输出国。中国还积极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为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建设资金。

此外，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上在不少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为推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还开始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如从2019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费贡献国；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参与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在根据需要适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国际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让国际治理机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减贫、治国理政、能源转型等方面的经验，都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⑥

本文作者胡必亮为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创造发展新机遇。图为2014年7月1日，首批来自中国的零关税货物抵达瑞士最大内陆港巴塞尔。（摄影/新华社记者张森）

印中经济改革比较

文 / Mahendra P. Lama

印度和中国都把经济改革作为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

对印度和中国而言，经济改革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但改革通常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两国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是截然不

同的。印度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政局的不稳定使危机不断恶化，加之受困于“印度教徒式的增长率”（即1950年至1970年印度长期的低增长率），政府最终

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结构性调整措施。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长期的资源错配，中断了经济发展，再加上中国长期被隔绝在世界经济金融系



2012年11月26日，第二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摄影 / 新华社记者李毅刚）

统之外，因此必须依靠积极稳健的结构性改革恢复增长。

从改革的时间表、领域、强度和持续性、政治承诺和民众接受程度等方面来看，两国的改革举措和执行情况迥乎不同。两国当前处于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改革的影响力、特点和程度均存在差异，但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均已降至25%以下，第三产业占比则直线上升。此外，两国的储蓄率、投资率、贸易额占GDP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等指标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两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相似之处，那便是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地区性差异，部分地区改革行动相对迟缓。在中国，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效推行了改革，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对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等西南地区的内陆省份而言，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提出近20年，这些地区仍未充分实施改革并从中受益。印度也是如此，南部和西部诸邦锐意改革，已经推出第二轮改革举措，但发展滞后的北方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以及多山的喜马偕尔邦、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北阿坎德邦等地区却长期落后。

消除贫困与不平等

不难发现，在印度和中国，提振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和扩大消费是减贫的主要动力。造成贫困的因素有很多，或是社会经济资源匮乏、政治文化隔阂，或是缺乏发展所需的国家资源、技术和地理空



2011年3月6日，印度西里古里的居民在街边市场买菜。2010年，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新华社）

间。1994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5.3%，但2012年这一数字已降至21.9%。尽管如此，目前仍有2.7亿印度人生活赤贫。2011年，印度的基尼系数大约是36.8。印度推出了一系列国家战略，如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受教育权和粮食权保护政策，卓有成效。

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过去五年里，中国有6000万人脱离贫困。对此，很多人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这是因为中国的减贫成就历来有目共睹。早在十年前，世界银行核查“每天一美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时提到，1990至2004年，中国大约有4.07亿人脱贫。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即通过具体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和保障涓滴效应的机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让更多人脱贫。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希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让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达到小康”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被提及。

生产领域的变化

在印度，公共部门的经济主体曾占据制高点，现在却面临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从国家资本撤离到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一系列措施正在逐渐落实。汽车等制造业领域以及纺织品、食品等家庭消费品领域的发展均呈现上升态势。但相较中国，印度对研发的投入，不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显得相当少。

与印度不同，中国经济的增长最初是靠海外归国者的巨额投资，随后日本和美国的大型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不久，“中国制造”开始生产索尼照相机、东芝笔记本、惠普电脑等电子设备。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指导下，“中国制造”的名牌产品开始涌入国际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国。在印度看来，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国际融资领域的关键一环。印度《2014-2015年度经济调查》中写道：“如今，对于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国家政府来说，中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之一。中国拥有海量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



2012年4月14日，印度工人在安装太阳能面板。印度政府于2010年启动“全国太阳能计划”，目标是到2022年，使其太阳能并网发电能力（总装机容量）达到2万兆瓦，不接入电网并自行使用的太阳能发电能力达到2000兆瓦。（新华社）

苏、山东、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中国将近一半的GDP都来自这11个缺水省份。该报告还称，其中有8个省级行政区水资源极度匮乏，在人均500立方米以下。

中国的“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引水工程，预计总投入将达814亿美元。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条线长约1432公里，主要是从露天河道引流，用以缓解水资源紧张，改善水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则依靠京杭大运河，将长江水从江苏都输送至山东。

南水北调工程已经让北方地区的5310万人受益。自2014年末运行以来，南水北调工程已向北方干旱地区输送近100亿立方米水。这一工程输送的水不仅供应北京、天津等城市，河北7个城市的居民以及河南37个县的居民也上了南方来水。

在印度，尽管最高法院已经指示政府修建“根河-贝德瓦河”等河道联通项目，但对于缺水地区的人们而言，出于环境和可持续方面的担忧，引水计划仍像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本文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高级教授。

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

在印度，电力系统整体由公共部门主导，在各邦分别设立负责发电、输电和配电的三个机构。这些机构受到国家层面和邦层面的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监督。这一举措减少了产业补贴，吸引到大量私营企业进入电力行业，印度的电力产能飞速提高，供电量和可靠性均稳步提升。当然，这一变化也离不开关税大幅上升的背景。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中石油等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甚至跨越亚洲、欧洲和非洲寻找更廉价和可持续的能源。

基建跨越式发展

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改革堪称典范，不仅建有道路、铁路、机场、海港、通信、银行等实物基础设施，而且建立了教育、健康和饮用水等社会性基础设施。中国曾以日本和美国为榜样，大力推行基础设施改革，打造了堪称奇迹的深圳经济特区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受关注，该倡议将中国国内的基建模式引介给其他地区，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等。

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仍落后于中国。目前，印度基础设施在全球144个国家排名中仅列第87位，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基建投入（其中7500亿美元需靠举债融资），从而助推其实现年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早在2006年，印度就已推出“印度基建融资”计划，财长亚伦·杰特利也称基础设施和投资是“变革印度”的第五大支柱。2016年至2017年，杰特利批准拨付了大约330亿美元，用于两个重要的公路和铁路项目的建设。

应对水资源危机

对于中国实施的公共健康政策、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可再生资源、推进去中心化的工业化、食品安全、精准扶贫、以及绿色发展等政策和战略而言，水资源是极为关键的保障要素。中国水危机组织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题为《为了一个水资源和能源安全的中国》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有11个省级行政区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标准线，其中包括经济发达的江

中印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

文 / Swran Singh

中印合作能够加快人类的整体发展进程。



2014年3月19日，金砖国家第六次智库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结束，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学者共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摄影 / 新华社记者高原）

同为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两国正在快速改变着世界格局。中印两国有关改变人类社会未来的潜力，这一点如今已经得到广泛认

同。中印两国要想成功，需要携起手来改变国际社会。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北大西洋转向亚太地区，世界地缘政治由此发生新的变化。中印两国的合作可以加快人类社会发展的

步伐，这一变化如今已经在两国国内及其邻国初见端倪。

中印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近年来，两国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与日俱增，积极信号不断传出。在

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下，中印两国不断协调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也是回顾过去几十年来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契机，并可籍此探寻两国关系未来走向。

两国关系重归于好

毫无疑问，西方的殖民历史以及冷战给中印两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直到如今仍影响着两国对对方的看法和政策。两国曾经耗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来弥合殖民或半殖民时期遗留问题所造成的分歧，并且两国在冷战时期一度站在了对立的阵营。

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两国开启了重修于好的进程。尽管时断时续，但这一进程还是延续了下来，两国确立了“求同存异”的双边关系发展原则。这一阶段中印两国国内都处于非常时期。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两国意识到贸易可以增进双边了解和互信。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两国关系按下了期待已久的“重启键”。90年代早期，贸易成为了两国和好过程中最可靠的支柱，建立互信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这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1991年和1996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先后访问印度，良好的政治氛围促成了两国政治互信协议的签署。领导人的破冰访问之旅为两国关系打下了牢固基础，自此中国领导人

访问印度大多不再同对其他国家访问的行程绑在一起。这一时期，两国建立起了多个双边磋商机制，定期探讨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各种事关两国和平和安全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空前快速的发展时期，印度也开始对外开放和结构性改革实验。当时，中国已经积累了十年经验，并向世界展现了全新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方式。中国同包括其所谓“竞争对手”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也借此巧妙地避开了美国知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时期，中印两国都与东盟等一批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两国很快在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下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一些区域性国际问题。90年代早期，中国加入了一系列国际组织，而印度已经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印双边贸易，加强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互信。虽然在1998年5月，这一势头一度受到印巴核试验的影响而中断，但是中国和印度很快又重启了对话，双方已经意识到，多边主义是解决安全和发展所面临挑战的唯一途径。尤其自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安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关系快速回暖。

中印的崛起

21世纪发展至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则成为第五大经济体。随着两国国际地位提高，海外

同胞更加积极地通过投资和捐助支持国家建设。两国如今都参与到了海外重大项目建设活动中。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家组织和机构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此外，中国-尼泊尔-印度文化走廊正在磋商之中。印度一些人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新的争议点，也有印度媒体讨论要抵制“一带一路”倡议。印度政府也间接表达了忧虑，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会加强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和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不过，印度政府其实只是缺席了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反对的只有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也乐于同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还一起在亚丁湾开展打击海盗的行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印有必要维持多领域合作的均衡，并确保两国之间存在的竞争不会使双方关系脱离正常的轨道。

多边框架下的互动为两国关系带来了积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两国都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各自的关切，越发能够正确看待双方的敏感问题，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对峙和僵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是处事果断、踌躇满志、充满干劲的领导人，他们已经构建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两人在各种多边会议场合频繁互动，为解决双边问题创造了机会，同时多边场合下的会面可以使其避免公众和媒体对双边会



1978年4月15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各个展览馆展出了丰富的出口商品样品和科技新产品。图为印度客商在交易会展览馆内听讲解员介绍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的建设成果。（摄影/新华社记者陈学思）

谈成果的过度期待。这种对话方式在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在厦门金砖峰会召开之前的各种多边会晤中，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对缓解边境的紧张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莫迪和习近平2018年4月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又为中印关系未来发展开了又一个好头，如今“武汉精神”成为了双方沟通合作的指导原则。

未来发展方向

虽然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仍然是双边关系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但是两国可以通过加快解决其他问题，为最终解决

这一难题创造更好的氛围。长期以来，印中贸易存在着巨大的逆差。2017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为844.4亿美元，而贸易逆差接近600亿美元。中国也认可保持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贸易平衡可以促进双方经济往来。最近，中国主动放开对除香米以外的印度产大米和糖的进口，这便是个很好的开始。此外，近期中国在印投资也快速增长。中国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减少印度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而且会增强印度的出口优势，从而减小贸易逆差。重启中印“手拉手”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和双方训练

机构的军官交流也是加强双方合作的重要举措。同样，印度也照顾了中国对于印太战略、美印日澳四边会谈等敏感问题的关切。

中印在各种层面上的持续互动，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之间的会晤，为两国更好地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和平繁荣以及改进国际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斯瓦兰·辛格是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邓小平：印中关系奠基人

文 / Sudheendra Kulkarni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为中印培育相互尊重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

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主席的演讲还表明，他是国际化和世界团结的坚定支持者。他表示：“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

没有哪两个国家比印度和中国更有义务“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印度和中国人口合计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国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国文化都崇尚和平、合作以及国际大家庭中各个国家的和谐相处。当下，印中又都面临着发展的挑战，两国需要彼此学习借鉴，并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当今世界需要新的经济、生态规则，以

及全球治理体系，印度和中国不应彼此竞争，更不应彼此对抗，双方应该是伙伴。中国外长王毅在《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印应是龙象共舞，而非龙象相争”，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印关系。

当我们审视2018年印中关系的起起伏伏，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帮助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大幅度提升，远超印度。中国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强大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转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谁的领导之下中国开启了如此翻天覆



2016年6月26日，游客在深圳参观新落成的邓小平画像，这幅画像拍摄于2004年8月16日。（新华社）



1987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摄影 / 新华社记者武基国）

地的变化？他对中印关系的看法如何？

印度朋友们有必要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当代中国的缔造者、印中关系的奠基人——邓小平。

迈上现代化之路

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塑造了历史。他与毛泽东一道，是当代中国的奠基人。40年前，他在中国

实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从此让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在邓小平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在此后短短的40年里，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未来十年内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4年，我在印度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向这位伟人致敬，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挽救出来，让数百万中国人

摆脱了贫困，点燃了中国人民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激情：奥运赛场上勇于争胜，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技术领域开拓创新，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

我对邓小平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任何一个国家勇于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开创新的发展道路，都值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欢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让大多数人脱贫并过上好日子，也值得所有人的认可和欢迎。更重要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与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美国建

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也推动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邓小平所创造的历史功绩让人印象深刻，但当我读完邓小平女儿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之后，我对邓小平的敬仰更是倍增。这本书讲述了在“文

了收音机、电视、自行车、缝纫机、腕表、洗衣机，很快又拥有了互联网。

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加速发展，继续朝着让十几亿人口实现温饱、国家繁荣昌盛的目标迈进。如今，即便物质条件还没有极大丰富，但早已

小平是第一个试图摆脱战争造成的创伤、缓和中印关系的中国领导人。1979年，两国关系“破冰”，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前印度总理、时任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瓦杰帕伊后来回忆道：“我必须说，邓小平以真挚的热情接待了我，我相信我自己也回馈了同等的热情，这帮助我们跨越了心理嫌隙，以乐观的态度向前看，从而为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篇章。”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年之际，瓦杰帕伊又回忆说：“与邓小平的会面十分愉快。那是两国发生战争多年以后的首次高层政治往来。”

在谈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时，瓦杰帕伊表示：“他是个十分坚定的人。他看问题的目光非常远大，这从他的讲话中就显而易见。”当时，邓小平对他说：“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现在应该抛开它，做一些实际事情来改善目前的气氛，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

瓦杰帕伊与邓小平讨论了边境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就是不要让边境问题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阻碍，双方应全面发展双边关系。同时，通过对话解决边境争议，避免使用武力改变“实际控制线”现状。

1982年12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成员。会见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决两国长期以来边境问题的务实方案。当谈及他与瓦杰帕伊的会面时，邓小平表示：“1979年，当我与你

“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不是个大问题。两国互不对对方构成威胁，我们之间只有个边界问题，两国都应该努力恢复到50年代的友谊。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解决问题并不困难。——邓小平”

革”十年浩劫期间，邓小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以及他的洁身自好。对于“文革”期间邓小平的经历，甚至是整个国家这段时期的历程，这本书都或许算得上是最好的传记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人格素养得以彰显。邓小平因反对“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干体力活，但这没有击垮他，怀着勇气 and 希望，他经受住了“火的考验”。恢复职务后，他以加倍的决心“拨乱反正”，挽救自己的国家于危难之中。

邓小平对经济改革的信念、振兴中国的决心以及提高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愿望，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埋下了良种。经过10到15年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改革，中国更多的家庭拥有

不再短缺，足以让普通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时，习近平主席表示：“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邓小平的印度印记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包括印度。其实印度与邓小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影响了印中两国的关系。

中印边境战争之后，邓

们前外长瓦杰帕伊会面时，我当时向他提出了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倡议。如果两国都能做些让步，问题能够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不是个大问题。两国互不对对方构成威胁，我们之间只有个边界问题，两国都应该努力恢复到50年代的友谊。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解决问题并不困难……”

他还表示，两国边境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这个问题要考虑双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如果双方都同意“一揽子解决”办法，两国能够让各自的人民理解并接受。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又取得重大突破。拉吉夫·甘地与邓小平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双方都充满了真挚的热情。这一幕让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国家向往和平和友谊的人，久久不能忘怀。

邓小平对拉吉夫·甘地的来访表示欢迎，表示这次访问将成为中印重塑友谊的起点，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个国家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也将成为朋友。

拉吉夫·甘地对此表示认可。他说道：“我们两国之间的确经历了一些困难。我希望双方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邓小平表示，友好是双方共同的愿望。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印彼此之间并不愉快，两国应忘掉过去的愉快，一切着眼于未来。拉吉夫·甘地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两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1988年12月19日至23日，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夫人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图为12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甘地总理。（VCG）

从夯实基础到“武汉精神”

从那时起，双方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改善两国关系。2003年6月，瓦杰帕伊又一次到访中国，当时我作为助手陪同。这次访问使双边关系的改善取得了重大突破，包括边境问题的谈判。两国均派出高级官员举行会谈，有关边境问题的双边对话由此进入了快车道。双边贸易也快速发展。2004年，瓦杰帕伊回忆道，“去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都与邓小平有关。首先，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着务实的、高瞻远瞩的工作作风。第二，比起我1979年的到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我认为中国在各个领域的进步，尤其是在短时间内让庞大的人口脱贫，是人类的进步。历史会因此而铭记邓小平。”

在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下，印度和中国不断夯实和加深双边关系的基础。尤其是最近四年多时间里，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了15次，仅在2018年一年就会面了五次。两国高层之间的默契和频繁往来，凝聚成为“武汉精神”，为印中关系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印度和中国，都具有悠久的文明和古老的智慧。作为两个亚洲大国，双方全方位的合作不但可以惠及两国，还可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 Sudheendra Kulkarni 是印度知名政治评论家，曾任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的助手。他还是新南亚论坛的创始人，该论坛聚焦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

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文 / 徐佳宾

制造业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8年3月23日，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的工人在复兴号动车组生产线上工作。2018年3月，唐车研制的中国首列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开始行驶试验。改革开放40年来，凭借着工匠精神，中国正在经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华丽蜕变。（新华社）

中国从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至今已有40年。在这40年间，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现代制造业，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实现了规模扩张。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产出第一的制造大国。40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195亿元增长到242707亿元，2017年占国民经济比重接近30%，是当之无愧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大产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逐步由大转强。制造业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近年来，尽管受到全球金融汇率市场紊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贸易整体萎缩以及全球需求不足等危机影响，中国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工业产值逐年攀升。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25%，全球实体经济财富超过1/4由中国创造。

可以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系列成就，归功于其主动作为，采取了包括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优化产业供给结构、增强创新引领能力、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等措施。

从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而言，中国制造业在40年间逐步实现了由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降低了单位物耗和能耗水平，提升了绿色生态发展能力。

从优化制造业供给结构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让制造业充分发展以反映消费需求。自此，中国制造业顺应了社会消费升级的需求，制造业的发展满足了居民吃穿住行的主流需要。社会消费需求引导了制造业的主导产业的循序更替过程，有力地带动了传统制造业改造和新兴制造业的培育。

从增强制造业创新引领能力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加强了研发投入的强度，产业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随着制造业产业体系向中高端攀升，制造业重点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突破。

从制造业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这极大增强了企业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在国内市场上，民营经济获得了和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同等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制造业发展获得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稀缺的资源，这都为制造业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未来发展之路

当前，中国制造业从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升级迈进，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历史性交汇，促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柔性制造、网络制造、智能制造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以智能制造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

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先进方向快速发展。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互联网大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坚实的制造基础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新兴科技和产业领域已取得一定突破，这让中国具备了抓住这次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的智能制造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效：体系初步形成；关键领域实现了一定突破；试点示范成效明显，形成了一批值得推广的新模式；开放合作不断深化，在多个方面与国际开展了务实合作。

然而，在面临难得历史机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发展也存在着难点。目前，中国整个制造产业体系正在进行的升级建立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基础上。而当前中国所要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而是信息经济条件的工业化，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因此，近几年，中国开始对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作出战略响应，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建设，明确了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提出了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路径。

本文作者徐佳宾为中国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教授。

长三角一体化：破壁与互联

文 / 陈建军

长三角一体化一方面意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聚平台，同时也在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探索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新路径。

长江三角洲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以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为中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三省一市的重要经济区域。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主要是指长三角各省市之间打破地区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构建统一市场，推进合作与交流，实现互联互通、共治共享，从而助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规划。

互联战略

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口达2.2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该地区GDP产出约3.5万亿美元，占中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2017年，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的人均GDP更是达到11000美元以上。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苏州、无锡、宁波等26个城市，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群之

一和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常态”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经济也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为实现更高起点的改革开放，完善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并与已有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相互呼应，中国需要加快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步伐，更好地发挥其对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

长三角一体化是率先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战略，希望通过推进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高起点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长三角地区通过一体化发展，将着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聚平台，探索大中小城

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大都市群。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打破地域行政边界，推进区域合作，探索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新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引导人民走向美好幸福生活的发展实践。国际上，在破除地域（国家）间要素流动壁垒、构建统一市场方面，欧洲二战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长三角一体化有一定相通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体制整合和发展融合的过程，是在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区域一体化。相较于欧洲国家在欧盟旗帜下进行的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货币、贸易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整合，长三角一体化更注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



2014年9月21日，江苏苏州，南京海关关员在“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应急协调中心”进行通关一体化业务系统联调测试。次日，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启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五地海关率先实行通关一体化。（摄影/新华社记者孙参）

素的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从而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效率。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长三角城市群越来越成为一个标杆。

全域发展

多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中国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范本。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市场化程度高，民营企业发达，企业家资源充裕。长三角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推动产业转移和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在实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过程中逐步弱化地区间的行政壁垒，推动了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多年来进展平稳。一个包括三省一市主要领导人座谈会、常务副省长会议、省级发改委地区合作部门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三

层四方的区域合作体制已经初步建立。长三角区域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纷纷出台，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体制机制保障。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杭州、南京、合肥、苏州、宁波、无锡等城市也跻身国内外著名城市之列，一些中小城市如浙江的义乌、江苏的昆山、太仓、张家港等也都发展出具有各自特色的产业。

近年来，上海提出了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呼应上海，江苏提出打造全球产业创新中心，浙江提出建设“数字大湾区”。朝向共同的目标，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此外，绿色发展正成为长三角的全域共识。打破区域壁垒、共同治理环境也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行动纲领。

破解瓶颈

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出发，长三角一体化仍在进行中。以上升国家战略为契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还需破解一些瓶颈。

首先是协同治理模式的完善和一体化效率的提升。目前已经形成的长三角协调发展体制基本上还是在政府体制内形成的“决策—执行”闭环。要真正发挥长三角协同治理的效率，需要将政府行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进一步结合，鼓励企业以推进产业链空间分布优化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同时，需要加强相关法制法规建设。

其次是加快从市场一体化向社会政策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民生服务一体化转变。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浙沪地区，虽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已基本实现均等化，但在民生设施、科教文卫设施的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完备性方面，各城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加快长三角城市之间社会发展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治共享。

第三是要解决区域和区域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开发区与开发区之间的同质化发展和过度竞争问题。长三角一体化要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有规则、可控制的合作竞争机制。合作是为了更规范、更有效率地竞争，同时又以竞争进一步完善合作。

本文作者陈建军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一带一路”： 重构与反哺全球化

文 / 储殷

中国正在通过互联互通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举措，将从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红利反哺到整个全球化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40年的实践之中，无论内外局势风云变幻，或是世界经济起起伏伏，中国坚定不

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决心没有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领域四十年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越发展，

对外开放的程度就越高，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方式方法就越多样。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



2007年，外国人在西安乘坐绿皮火车。西安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也是中国最受外国游客青睐的旅行目的地之一。（CFB）

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开启了新篇章。“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五年来完成了从顶层设计到规划落地再到全面推进的过程。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逐步落地将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固有模式，推动中国进一步打开大门，拥抱世界。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一次重构。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了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这一“开放新格局”既是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受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产业布局的制约和限制，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不同步倾向，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先行，打通中国中西部地区同欧亚大陆国家之间的通道，让贸易流、资金流和人员流畅往来，对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平衡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对外开放形式的升级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



—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8日，“‘一带一路’中医药针灸风采行”英国站活动在剑桥大学举行。英国针灸协会主席菲利普·罗斯尼尔（右）与英国中医师协会主席马伯英（左）在一尊英国收藏的古代针灸木人像前进行交流。（VCG）

年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0亿美元。相比于40年前单纯依靠出口换取外汇的时代，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货物出口来支撑了。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形式从原来的单向输出商品换取资本转向为与世界更加紧密、多元而深入地相互连通。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伴随“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

各国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念的一次重构。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是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不是中国的“小圈子”。过去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体现出中国在对对外开放道路上正在经历着一场观念变革与理念重构。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建设也展现出了对外开放的新思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更趋务实，更加关注民生所需，更加重视沿线国家具体的项目落实。

伴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逐步完善，更多的贸易往来与经贸交流，更多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无疑将会更加深化中国同世界之间的联系。而不同于以往的是，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将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原创方案。无论是系统走出去的中国铁路建设，还是布局全球带来跨境电商新形式的天猫国际、菜鸟全球物流或是支付宝体系，中国从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红利，正在通过互联互通的新方式，通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举措而反哺整个全球化进程。

本文作者储殷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智库研究员。

金融：如何更好地开放？

文 / 黄益平

40 年来，中国金融开放政策进程为更好地设计和执行下阶段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与教训。

1978年末，中国金融业百废待兴。经过十多年重建，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等在内的中国金融体系初具规模。

随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采取了两大金融开放举措：一是1993年实施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在随后的20年间，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二是于1994年初采用汇率双轨并轨机制，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

到1996年下半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写信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中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并准备再用5至10年的时间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计划暂时迟缓，但并未改变中国金融开放的方向。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明确承诺向外资开放金融服务业。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出口非常活跃，

外汇储备也迅速积累，同时也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

2004年1月1日，中国成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以此为标志，改革波及各类金融机构，至2012年

中国光大银行在中国上市告一段落。本轮改革使中国金融机构开始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式、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加速了中国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人民币在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资本市场发展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充分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路径。（CFB）



2016年1月27日，中国银联国际与澳新银行在新西兰宣布合作。图为当日合作仪式上，中国银联国际首席合作官李荣源（左二）完成首笔银联卡在新西兰的交易。（新华社）

国际支付和储备中的比重稳步上升，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出新贡献，这将引领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融为一体，影响世界金融发展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施行40年，如果用宏观指标来考量金融开放政策，成绩无疑非常突出。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国际收支比较健康，对投资者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发展巨变，同时也为中国更好地设计、执行下阶段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

经验和教训，对其他正在开放中的新兴市场经济或许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改革政策的先后次序。金融改革要讲次序，这是有共识的。如果改革没做好，打开金融大门容易引发风险。因此，中国在下一步实践中，应尽量把“以开放促改革”和“以改革助开放”结合起来，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大幅提高汇率的灵活性，然后才能考虑跨境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开放。

第二可以着重考量的，是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先试。金融服务业开放不涉及资本大进大出，同样受到国内监管，风险相对较低。同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会提升行业竞

争水平，带来新的经营管理技术，有利于维持经济增长。

务实确定资本项目开放目标也是关键所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策界形成了新的共识，即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可能会带来较大风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改变政策立场，允许各国出于维护金融稳定或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动机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局部和临时的限制。对中国来说，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完全承受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后果，基本开放也许是更务实的目标。■

本文作者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

文 / 孙咏梅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削减贫困效果显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等途径，更多地向“利贫”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7.4亿贫困人口在这一时期摆脱了贫困。中国巨大的扶贫成就不仅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有关经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研究就层出不穷。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十分盛行的“涓滴效应”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会自动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增长会自动减少贫困。但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自动惠及穷人，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伴随着穷人福利水平的下降。由此，“涓滴效应”受到质疑，人们开始更多提及“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减贫成就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削减贫困效果显著，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和更好的就业和创收机会；二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使政府更有能力去帮助贫困人口。

从经济总量上看，2017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82万亿元，较1978年的3678亿元增长了222.9倍。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17年的5.97万元，并且于2010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都为中国大规模减贫提供了财富和动力。

此外，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相对发达的城镇

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减贫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农村，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以农业和消费品为重点的发展能够增加低收入人口的就业，这是一种更加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发展战略。此外，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持续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不断的技术进步和有针对性的开发式扶贫投资也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收入分配的贫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相对发达的城镇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减贫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图 为 2018 年 3 月 23 日，汶川县水磨镇八一小学准备放学回家的学生们。八一小学是十年前汶川大地震后军队援建学校中距离震中最近、施工条件最艰苦的一所。（摄影 / 人民画报记者郭莎莎）

富两极分化现象也不容忽视，进一步缩小贫困人口规模面临着较大的瓶颈。

对此，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使制度和政策向更有利于穷人的方向转变，同时也要改变扶贫项目的实施方式，使贫困人口更多受益。例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规定的“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就是政策倾向“穷人收益型”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例子。

面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有几点经验教训

可供世界参考。首先要避免农业出现低增长与高贫困的“恶性循环”。其次，不能仅仅依靠财富创造的速度来带动贫困的减少，而要让创造财富的机会更为均等。与此同时，还应改变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消除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在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加大国有成份，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收入分配制度中，通过宏观调节，扭转资本要素所有者收入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所有者收入增长率的现状，扩大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的比重。最后，需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缩小对外经济依存度。

中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比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又如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法制不完善，垄断和腐败的出现导致贫富差距等。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目标和方向是对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更多地向“利贫”发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等途径，缩小贫富差距，赋予穷人以更多的发展机会。^[6]

本文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治理之路：变革与发展

文 / 魏礼群

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人民立场，探索统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核心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之后，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功案例和参照对象。40年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也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社会全面发展，社会治理领域

的变化广泛而深刻。

纵观40年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主要突破在于改变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放松社会领域管控，释放社会活力，让全社会活跃起来。

第二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主要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基本框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始致力于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深化社会治理变革，着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地运行。

对比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体制和结构的演变往往曲折复杂，充满矛盾与变数。而在长达40年疾速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始终保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这也是中国社会治理



图为1994年2月7日，浙江省温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这是当时浙南地区唯一一家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新华社）



2003年5月1日，北京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开始接诊“非典”患者，医务人员在为接诊做准备。“非典”危机带来了中国对公共管理体系的全面反思，促使中国公共权力结构朝着公开、透明、问责、效率的方向不断改进。（新华社）

领域深刻变革所取得的最为重要和显著的成就。

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治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坚持不断解放思想，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勇于用世界眼光和时代发展要求审视社会领域现状，推动社会治理变革始终体现出时代性和创新性，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与经济建设和经济治理改革等其他领域变革一样，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改革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

国始终重视研究与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做法，但不去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与模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立场，依靠群众创新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取得社会治理变革一系列成就的根本所在。只有切实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社会治理。

同时，坚持统筹协调推进，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信息时代中的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形态多元的网络社会，其复杂性和风险性使

得社会治理难度加大。这方面的治理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治理质量、效率和效能的同时，注重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积累，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紧密结合，以实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6]

本文作者魏礼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局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

对印投资：从竞争到合作

文 / Aravind Yelery

从最初的消费类产品贸易到如今对印投资、开办合资企业、竞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企业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经济的方方面面。

“走出去”，去印度

简单的经济学关系似乎并不适用印中两国的关系，也不适用于判断两国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正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成熟。

印度的经济发展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受到各种质疑，国际评级机构也不看好印度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在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中，印度依然处于前列。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口，经济预期向好，充满活力，并决心提高标准，在制定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规则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稳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尽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其邻国印度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中印两国在经济上合作与竞争并存，两国的竞争被视作本世纪的重头戏，在一些领域，两国也确

实互相怀有戒心。

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印度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扩展迅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体现在商品销售的增长上，还体现在金融、知识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等方面。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2019财年其GDP增长率将达7.3%，2020财年则为7.5%。到2025年，印度人均收入预计将增长125%，届时印度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市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印度一跃而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由于印度实行鼓励投资的政策，并且向外资开放了多个领域，2015-16财年印度累积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数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2016-17财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60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从2014年4月至2017年12月，印度吸引了

20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无须讳言，印中两国的关系在2017年经历了波折，但是投资和贸易数据却表明，经济活动同政治行为正日渐背离。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17年增长到了844.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期印度对华出口与2016年相比上涨40%，达到了163.4亿美元。这一趋势无疑令人振奋。尽管中印两国领导人早在2015年便已经设定了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但此前几年来却一直在700亿美元左右停滞不前。

印中两国贸易额自2001年开始攀升，两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对打造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印度商务部的数据，贸易仍然在两国的经济往来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对华贸易额的增长也让印度产生了忧虑。印度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也



2018年11月23日，中国出口印度那格浦尔的首列地铁列车于前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下线。（VCG）

让印度的微观经济政策变得越复杂，对进口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过去的GDP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在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其产业和贸易结构，也出台了一批补救措施来让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中国决策层的早期措施包括“走出去”战略，国际化以及产品和供给线多样化。中国的领导人想要跳出货币和短期贸易政策的圈子，加强对外投资，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来建立长期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融合市场的外向型投资策略旨在减少中国一些行业的不平衡问题，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帮助他们更好地对接国外市场，

并保护他们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转变。随着贸易额的进一步增长，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

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此外，中国“走出去”战略激发的对外投资，一方面让印度看到了中国在缓解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所做出的努力，有助于印度更好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也有



2002年1月29日，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印度的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宣布开展其在华业务，并在上海浦东软件园建立其软件开发中心。（VCG）

利于绕过印度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行的贸易限制。

对印投资的历史路径

对于改革和开放，中国和印度有着各自的举措，从印度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及其他配套措施。印度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两万亿美元规模，如今正努力通过重新调整资源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平衡不同行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印度各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施行自由化政策之前，联邦体制的权责划分限制了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各邦无法影响投资，并且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不能单独持有立场。而在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之后，则鼓励各邦重新整合自己的经济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则积极研究印度各邦的法律和经济状况。印度各邦提供的新的市场空间以及包括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这让它们成为外资的宠儿。一系列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印度各邦的市场规模、集群效应和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对于吸引外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税收和劳动力成本则起着阻碍的作用。因此，印度各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还过度依赖联邦政府的帮助，后来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变。由于财政收入下降，资本减少，各地因原有资源无法弥补财政赤字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必须采取与国家层面改革相一致的措施。印度受外资青睐，还有另一地方层面的原因，即地方政府可以用土地使用



2004年12月4日，“第二届印度制造产品展览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来自印度的60多家代表企业展示了机械、化工、软件产品及农产品等。（VCG）

权来吸引投资，这一点同中国一样。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印投资大多涌向了靠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奖励措施来吸引外资的地方。

从2014年开始，电子、房地产、纺织、可再生能源、自动驾驶、初创企业……中国企业对在印度大范围的产业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从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数据中能明显看到。中国扩大对外投资的策略和莫迪政府推出的“印度制造”政策一拍即合。

追溯外国直接投资的走向有困难，企业常常经由同目的国有税收互惠协议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同中国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差别很大的原因。根据印度商工部产业政策促进司公布的数据，2000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中国对印投资只有17.8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的报告则显示，中国对印投资达到了80亿美元。不过两国都认可的一点是，绝大部分投资活动都发生

在2014年之后。据估计，中国对印度的投资累积总额大概在120-130亿美元之间，印度市场上的中国公司大概有200家。虽然说同美国、英国、日本在印度的投资规模相比，中国对印投资要少很多，但增加速度很快。

寻找可持续的经营之道

印度各邦在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上竞争激烈，例如在2014年，新成立的安得拉邦为投资者提供了多项优惠措施，例如免除消费税、推行免税期、减免入市税、提供无息贷款、免费使用土地等。这些措施契合中国稳固和提高贸易收入、扩大海外市场、整合落后产业、开辟新市场来提高利润的目标。如今，中国企业已经在印度各地投资建厂。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印度找到了可持续盈利的经营之道。印度联邦制之下，各邦对国外投资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激励措施，中国已经学会如

何在其中得心应手。如果其他国家的公司能够在印度生存并蓬勃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公司无疑也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印度，中国公司可以探索的还有很多，这会让中国更加了解印度，并且能促进两国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

必须意识到，中国同印度的经济往来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印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中国企业通过快速订单出售的消费品和大宗商品，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边贸易的性质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两国间的贸易变得更加成熟，之前的“商品”已经被受到更加严格检查的货物或产品所代替。印度制造商对零部件的需求多样化，因此产品需要满足一定的质量标准。例如，十年前相当一部分贸易涉及此类商品。因此，中国的供应商不仅可以在印度大城市找到客户，一些邦的腹地工业区和产业聚集区同样存在机会。

这是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可以打破第一层供需瓶颈的地方。比方说，马哈拉施特拉、西孟加拉、古吉拉特三个邦港口等基础设施完备，劳动力充沛，仍然是中国产品和公司的主要目的地。为了增强对印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性，中国企业需要提供一系列新的产品，从以需求为导向的供给转变为以供给为导向的需求，从而拓展在印业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本身就是个挑战，但同时也是在印度市场上拓展上述领域之外商业空间的有效途径。

价值链与新策略

下一个阶段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中国企业不仅仅向印度出口商品，同时也为印度经济作出了贡献。作为印度经济的有力促进者，中国企业在印度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这种互动体现在印中各个合作领域，包括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购、竞标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能源生产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建立价值链，开辟新领域让中国公司的业务延伸到印度经济的各个角落。

如今，印度大多数邦都有中国公司在开展业务。由于印度各个邦的经济发展禀赋不同，中国公司也作出调整以适应当地的经济状况。中国公司不仅仅在泰伦加纳、恰蒂斯加尔等邦开设工厂，同时也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外，中国公司也有兴趣通过调整在印度的产业来提升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就从中国高附加值产业中获益颇丰。

中国公司在开发印度冷藏和供应链的市场上可以大有作为。这一领域对于印度东北大多数邦都很重要。中国一直在找机会分享其在农业商品化及生产相关产品上的经验。事实上，已有中国企业开始同阿萨姆邦当地生产易变质食品（肉类和新鲜水果）的龙头企业接洽，商讨建设相关设施的合作意向。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上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并进一步发展。

因此，对于希望寻找投资目标并建立长期重点业务的中国企业来说，印度是个理想的目的。通过地方层面对投资的促进和拉动措施，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产生协同效应。□



在 2005 年世界客车博览亚洲展览会上，世界客车联盟秘书长吕克·格洛里厄认为，印度正在与中国共同成为世界客车产业中心。图为中通客车控股有限公司正在生产客车。（VCG）

本文作者 Aravind Yelery 是北京大学高级研究员。

以务实态度推进中印合作

文 / 毛克疾

对于印度而言，与其沉溺于寻觅证实其“发展潜力”的修辞话术和似是而非的虚高指标，不如承认中国的领先优势，并关注自身可以做些什么来赶超，这其实更有利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从世界500强管理层访问印度时的恭维话语，到印度“营商便利指数”或“全球竞争力”排名的快速上升，人们对印度前景的乐观情绪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态势。尤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冲击，印度不仅被视为与中国比肩的另一个新兴市场，更被描绘成继中国之后的又一个超级经济“发动机”。

然而，从印度经济增长的数据上看，其经济表现仍明显逊色于中国。因此，对于印度而言，与其沉溺于寻觅证实其“发展潜力”的修辞话术和似是而非的虚高指标，不如承认中国的领先优势，并关注自身可以做些什么来赶超，这其实更有利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中印经济差距或在扩大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可以从其迥异的发展道路中窥

见一斑。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两国经济总量大致相当，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GDP已是印度的近5倍。因此，即使印度经济增长率偶尔接近或超过中国，但两国绝对经济规模差距却在不断扩大。鉴于此，如果印度真的想赶上中国，它不仅需要实现更快的增长率，而且还需至少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然而，印度能否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仍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中国过去40年非凡的经济增长背后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便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国内生产力大幅增长。与印度相比，中国制造业更为强大，不仅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29.3%），还贡献了更多的

GDP增加值（39.5%）。得益于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经济现代化成果得到巩固，并开始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可以说，正是劳动力分配结构的不同导致了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印度虽说有着不俗的经济增长表现，但在工业化进程上却远远落后于中国。例如，印度农业只占GDP的15.4%，却雇佣了高达47%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工业占GDP的23%，仅雇佣了22%的劳动力。印度服务业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仅利用31%的劳动力人口创造了61.5%的经济产出。因此，印度经济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它具备了后工业化经济的一些特征，像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则暴露出其不发达的尴尬现实。

工业化发展的不理想导致印度如今面临方方面面的问

题。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印度无法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收入。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时，印度的大多数劳动力却在非正规部门辛劳地从事效率低下的工作。

此外，如今的印度经济几乎被所有主要金融和宏观经济风险所困扰，包括过度依赖外资、外汇汇率不稳、易受油价上涨以及季风影响。这些风险主要是由于印度制造业不发达或缺乏竞争力造成的，它们只能通过释放巨大的制造业潜力加以缓解。

现在，印度是时候考虑通过加强经济竞争力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采取一些救急措施，如资本管制、非必要的进口限制和提高利率等。正如一位外汇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人能够永远靠别人的钱生活。”印度经济发展的长期解决方案在于大力推动自身的工业化。

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路径

幸运的是，印度决策者已经看到了推进工业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已将“印度制造”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明确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图。在这方面，仔细研究印度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路径很有必要。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数量超过10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同样具有三个最重要的优势：一是规模大、



2018年7月8日，客商在印度中央邦城市印多尔考察柳工印度工厂新落成的总装线。当天，广西柳工集团印度工厂在印多尔开业投产。这是中国制造企业在印度正式投入运营的首个生产基地，也是柳工的首个海外工厂。（摄影/新华社记者王晔）

成本低的劳动力；二是规模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三是拥有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即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两国对其优势利用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迥然相异。

中国按照合理的顺序采取了“三步走”策略。它首先利用其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如低端的服装、玩具和家具制造业。随着专业知识、资本的逐渐积累，它又利用巨大的国内需求来培育企业，使这些企业在全世界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中端产业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而现在，中国正以庞大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主攻研发领域，从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这样，中国有望从集成电路、制药和航空等尖端产业中获得高附加值。

正是通过这样的“三步

走”策略，中国才能根据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最有效地配置和调动其掌握的资源。通过这样做，中国不仅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产出国，而且逐渐向全球价值链最顶端迈进。然而，尽管同样具备上述三个优势，印度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与中国从低端、中端再到高端产业的发展路径不同，印度实际上采取了一种“逆行”的模式。几十年来，印度一直以其极具竞争力的制药和IT服务业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著称。尽管印度手机和汽车零部件等中端产业近年来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生态系统方面仍然相对落后。最令人不解的是，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很不均衡，大量劳动力资源尚未开发。

这种扭曲的工业发展路径



图 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位于印度维沙卡帕特南的姚明织带印度工厂里，女工在生产线上编织。近年来，金砖国家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14 年，中国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在印度建立工厂，开展出境加工业务，解决了数百名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摄影 / 新华社记者毕晓洋）

让印度经济付出了重大代价，它既忽视了印度消费者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使得其不得不依赖进口；同时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国内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工作需求，使就业问题成为困扰历届印度政府的噩梦。

中印经济合作的现实需求

如果加强中印经济合作，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印度新兴的手机产业或许就是最好的例子。截至2017年，印度已超过越南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11%。截至2014-2015财年，印度销售的手机中仍有78%为进口整机，仅三年后，该比例就大幅下降至18%。这个巨大的改变主要归功于小米、Vivo、Oppo和华为等中国手机巨头纷纷在印度设厂。这些

品牌共同占据了印度手机市场60%以上的份额。

为了规避印度针对进口手机整机的关税壁垒，中国公司开始向印度出口零部件，并在当地组装。然而，印度于2018年4月再次提高手机及其零部件的关税，中国主要手机企业开始考虑将整个手机生态系统迁移至印度，并鼓励其供应商跟随其去印度发展。随着印度垂直供应链和水平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一个强大的手机生态系统正在印度市场形成，并将大幅降低当地生产成本。一旦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它将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业务，从而打造一条自我强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印度的手机产业发展由此终于步入正轨。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的所有中端产业中，这种发展模式似乎表现得最好，而这些产

业发展大多是由当地需求驱动的，如电子产品、工程设备和汽车零部件等。巨大的当地需求加上印度政府的保护性关税措施及专门的产业政策，使得在当地投资办厂发展商业的方法具备可行性。

尽管这些产业发展态势喜人，但它们在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出口方面的带动力却不如服装、文具和家居用品等低端产业。鉴于日本、韩国、中国，甚至最近越南的经验，正是这些看似低端的产业通过吸收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出口市场能够迅速博得出位，从而引领国家的工业化腾飞。

这样看来，如果印度能够在劳动法规和土地征收等领域进行彻底改革，那么劳动密集型 and 出口导向型产业将是最有前景的产业，它们可以充分利用印度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疲软的产业资本带来新的市场投资机遇。

如果工业化发展是印度迈向真正的全球经济强国之路上不可逾越的一环，那么中国作为同样人口数量超过10亿并在工业化方面领先于印度的国家，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这一点，两国的学者可能会更务实一些，与其沉迷于龙象攀比的陈词滥调，倒不如看看双方能够真正携手做些什么，来实现这两个大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本文作者毛克疾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从发展指数看中印

文 / Mukul Sanwal

尽管多个全球发展指数均反映出“印中相争”的意味，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经验。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创造并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印度应从中国汲取的重要发展经验。因此，全球创新指数成为了一项真正重要的参数。

2018年，印度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第57位，而中国排在第17位。相较之下，印中去年的排名分别为第60位和第22位，两国发展的活力和成果不断突显。

全球排名无疑是评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发展的重要指标，但这些数字仅仅能部分反映其整体发展情况。莫迪总理提出印度要在2022年前跻身全球创新指数榜前50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印度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劳动法 and 司法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实行全国统一税收。这为印度带来了系统性的变化，并通过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印度的综合排名。尽管部分其他指标拉高了印度的排名，生产力的提高依旧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印度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大投入。近年来，印度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发展生产力仍将是一场持久战。

印度的营商环境、物流指数、全球创新指数、全球零

售发展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全球性别差异指数等排名上升幅度均为全球第一。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将印度列为改革营商环境力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之一。



2018年11月7日，印度新德里，印度“春节”Diwali排灯节恰好碰上了中国的“天猫双11”，本来就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瞬间增添了更多“买买买”的乐趣和话题。（VCG）

2018年，印度的商业用电指数在各国中排名第29位，中国则位居第98位。在信贷获得指标方面，印度排在第29位，中国排在第68位。在纳税方面，排名第119位的印度同样领先于排名第130位的中国。

2017年全球零售发展指数显示，印度超越中国，成为30个发展中国家中零售投资方面最具吸引力的国家。这得益于印度政府推动无现金支付、推出全国通用的商品和服务税等政策。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印度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2018年第一季度，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到7.7%，而前一年同期这一数字为5.6%，制造业和投资增速持续攀升。中国经济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为6.8%，与去年同期持平。

这一系列的数字应当得到正确的解读。

印度经济正处于早期快速发展阶段，仍有大量的过剩资

源。因此，它可以利用传统技术提升资源转换率，取得新的发展。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生产力接近饱和的成熟发展阶段，所以中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依赖传统技术，必须通过创新推动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经济在另一个指标（即

经常账户赤字仍占其GDP的0.7%，同期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3%。

不同的发展路径

印度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印度是销售产品的巨大市场，而中国被视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制造基地。”

全球竞争力）上的增速也超过了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印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名中上涨了20位，而中国的排名基本没有变化。然而，竞争力的提高并不足以帮助印度减少财政赤字。在2016—2017财年，印度

第一个特征是相较于工业发展，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受其快速扩张的服务业驱动。印度目前处于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也意味着其制造业和建筑业发展具有很大潜力，将成为未来增长的动力。

第二个特征是印度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印度的上升轨迹反映出城市蕴藏着更多经济发展机会，政府也支持着推动城区发展的计划。劳动力从农业等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第三个特征是印度人口相对年轻。印度的大多数人口处于工作年龄（15-64岁）。据估计，2050年前，这一群体人数将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即使劳动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印度经济的总产出也将继续增加。



2006年10月11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的中国中兴通讯公司3G路演活动上，两名孟加拉国参观者正在试用展出的3G产品。中国企业在南亚地区的发展布局引人注目。（摄影/新华社记者朱峰）



图为 2009 年 11 月，印度切蒂斯格尔邦的矿工站在当地的煤矿上。当时印度正准备开放商业煤矿开采权给私人公司，以促进印度国内的能源自给。（新华社 / 路透）

相较于中国，印度在创新推动人均GDP上涨的幅度方面表现更为出色，但在技术获取和吸收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原材料、技术、生产方法等层面更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通过重点支持科技研发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创新成为其未来五年增长计划的核心。目前，中国研发支出占世界总量的15%，这一数值逼近美国，预计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来自中国的经验

1980年，印度的人均GDP略高于中国。随后，中国经济在1980年至2010年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渐渐甩开印度。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是印度的八倍，这不仅归功于其经济特区，还得益于中国整体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1982

年，中国的识字率为64.4%，而印度为37%。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印度。此外，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指标显示中国人口相较印度而言健康程度更高。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34个国家中，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排在第61位，而印度仅排第113位。另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排名第50位，而印度为第131位。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74%，而印度只有34%。在女性教育方面，中国位居第85位，印度排在第121位。

这些数据的落差包含两层意味，对印度来说是重要的发展经验。首先，跨国公司对中国和印度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印度是销售产品的巨大市场，而中国被视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制造基地。这就解释了外国对两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差异，也为两国经济增长、生产力和民众福祉带来后续影

响。此外，印度也应向中国学习，增加一项“学以致用”的技术政策。

2017年，印度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8年，印度超越英国成为第五大经济体。现在是印度重新审视其产业政策的时候了。印度需要通过增加研发投资和财政支持来培养潜在人才，从而提升全球竞争力。除了持续关注人力资本，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学以致用”。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发挥其不断增长的潜力，并从中国这个“邻居”那里学习成功地过渡到工业和知识经济的经验，完全取决于印度自身。

本文作者 Mukul Sanwal 是联合国前外交官，曾任北京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 40 年大事纵览

策划执行 / 《中印对话》编辑部

1978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签下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将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最为重要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

1979年

中美建交

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相互隔绝多年

的局面之后，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为中国同西方世界的交往交流打开了大门，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深圳经济（出口）特区设立



随着深圳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中国出口特区，1979年7月8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开山一炮硝烟腾起，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理念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从这里传遍全国，中国对外开放、拥抱世界的脚步越迈越大。

1980年

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开业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开业，虽然店面门头不大，装修略显简陋，但这种个体餐馆尚属新鲜事物。这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1981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与评价，为中国各领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82

修改宪法

1982年，经大规模修改后的《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以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并规定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1985年 百万大裁军



1985年中至1987年底期间，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 and 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精简40%，将原来的11个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

1986年 实施“863计划”



中国于1986年3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旨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随后包括平均亩产达到76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棉、性能指标超过

国际水准的国产超级服务器等在内的多领域科技成果都得益于此。

1988年 海南建省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口市海府大道59号正式挂牌成立，海南岛也在当年被正式划定为经济特区。一大批投资者和创业者踌躇满志，涌向天涯海角，把海南从贫困落后的边陲小岛建成了“四季花园”。2018年4月，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

1989年 启动住房制度改革

1989年，北京首批购买公房的职工领取了北京市房产证，北京住房改革全面启动。自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福利分房制度自此结束，住房商品化的改革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启。

启动“希望工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了一项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公益事业，名为“希望工程”。通过建设希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希望工程”改变了数百万失学儿童的命运。

1990年 中国股市诞生

1990年3月，中国允许上海、深圳两地试点公开发行股票，两地分别颁布了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同年12月，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双双开业或试运行。

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

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也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

1992年

邓小平南巡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他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热潮。

上海率先打破铁饭碗

1992年3月，上海柴油机厂通过签订职工劳动合同，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被端掉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国有企业改革随之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北京首家麦当劳开张

1992年4月23日，北京首家麦当劳快餐店落户王府井大街南段。当时它是全球最大的麦

当劳连锁店，拥有700个座位，29个收银台，开张第一天就吸引了4万多名顾客。

1993年

汪辜会谈

1993年4月，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正式举行。在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祖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在新加坡会面，这是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多年后举行的首次会谈，是两岸关系迈出的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

制定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动员全党和全社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科技进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1997年

香港回归祖国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

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一国两制”的国家治理创举正式开始实施。

政府“瘦身”



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1998年，中国政府以“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为目标，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机构改革。高效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为经济社会多领域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

1999年

阿里巴巴诞生



1999年9月，马云带领18位创始人在杭州的公寓中正式成立了阿里巴巴，抓住网络发展机遇，相继成立淘宝等第三方销售平台，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1999年，中国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规划指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人才交流等方面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发展和区域平衡。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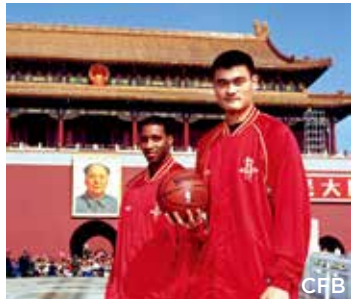


龚文豹 摄

2001年9月13日，中国全部完成了与世贸组织138个成员中向中国提出谈判要求的36个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从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中国由此开始深入参与到开放、竞争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并逐步与亚洲和世界共享繁荣发展成果。

2002年

姚明进入NBA



CFB

2002年6月25日，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被休斯顿火箭队以状元身份选中。作为中国篮球史和美国NBA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姚明激励中国球迷去接触他国的体育文化，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也给予西方了解中国的不同视角，为东西方的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南水北调工程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南水北调工程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规划区人口4.38亿人。目前，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一期）已经完工并向北方地区调水。

2003年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CFB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于2003年10月15日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航天员杨利伟及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国旗送入太空。这标志着中国成为前苏联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6年

三峡大坝建成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三峡大坝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全长约3335米，坝高185米，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对防洪、发电、促进航运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废除农业税



CFB

2006年，中国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种。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而且还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

2007年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新华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地球轨道。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

2008年

中国举办奥运会



新华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在北京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聚焦中国，不仅体现出了中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崭新的开放姿态，世界各国也由此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

2010年

上海世界博览会举世瞩目



新华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行，主题是“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共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观人数超过七千万人次，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

2011年

利比亚撤侨



新华

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政局持续混乱，中国迅速展开了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撤侨行动，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整个撤侨行动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经济、外交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现，被誉为“鲜活的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

2012年

召开十八大



VCG

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于

2012年11月上旬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科学发展观”作为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立场。随后选举出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站在了追求民族复兴、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2013年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意在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实施精准扶贫



CFB

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湘西、长沙等地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任务进行部署。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6年

人民币正式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初始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认可，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金融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201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号角，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十九大最为根本的政治意义在于它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成就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2018年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18年3月5日至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加长版“复兴号”开跑



2018年7月1日，首次投入运营的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上海虹桥站驶出，开往北京南站。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动车组列车。中国标准动车组让中国高铁总体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技术甚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行



2018年11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五大洲的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参展企业3617家，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进博会有利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扩大合作空间，拉紧利益纽带，有利于促进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46]

新 · 媒体 新 · 潮流

策划执行 / 《中印对话》编辑部

开放的“游乐场”

姓名：Tarana Reddy

年龄：27岁

职业：作家

出生地：印度金奈

现居地：印度金奈



我终于认清了互联网的本质。它本质上是个工具——只在我需要的时候才会去使用的工具。

早在1999年，我父亲就在家安装了电脑，当时在邻里之间煞是风光了一阵儿。直到2004年之前，我仍对家里这台笨重的通过“滋滋”叫的电话拨号调制解调器上网的台式电脑的用处充满怀疑，对它几乎没什么兴趣。这家伙有什么用？还不如看电视，

电视上会播日本动画片《百变小樱》和美剧《甜心俏佳人》，它们有意思多了。

家里装上电脑的前五年，我只有做家庭作业时才会上网。

自从同学们家里都装上可以联网的电脑，我们的家庭作业就发生了巨变。以前，老师只能挑选那些容易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找得到资料的课题，现在有了谷歌，任何话题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作业里。

不过，要是老师以为我们会在作业中展现出新颖、深刻又专业的见解，那可就错了。实际上，不少同学的作业都是从维基百科里全篇复制来的，有的甚至连Logo都还留着，或者是从老师推荐的文献里一字不差地抄袭来的。当然，时间长了，我们也学会了注明参考文献，“借鉴”手法也高明了一些。

没过多久，我就不怎么借助互联网做作业了。我加入了一个叫Hi5的社交媒体平台，把自己穿着纱丽的模糊照片传上去，还配上了幽默风趣的图片说明，解释我有多讨厌穿纱丽。我还用Limewire软件下载了两首歌——林肯公园的《In

the End》和艾薇儿的《Sk8er Boi》，算是第一次为网络盗版“作了贡献”。

后来我开始使用脸书（Facebook），这个软件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2010年初，因为脸书总是发布些很白痴的内容和广告，我才转而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因为从事了一份以写作和社交媒体营销为主的工作，互联网便不只是我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我的生活热情的源泉和维持生计的关键。

可是，重度依赖互联网所造成的焦虑也随之而来。

直到去年年底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是一次露台聚会，我把手机插在室外的插线板上充电，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回去看，发现屏幕已经碎成蛛网状了。

那时我刚从班加罗尔回到家乡金奈，赚的钱也不多。我坐在床上幽怨地望着那个坏掉的手机，决定暂时先不用手机，等攒够钱再买个好的。

刚开始我挺不安的，但结果很令人意外。我发现，每天自然醒比被工作短信吵醒舒服多了。记得有次参加完聚会，因为

没有手机，没法看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什么，我非但没觉得失去了重温聚会的机会，反而内心很平静。第二天一早醒来，一切如常，我的内心依然很平静。

就这样，我在没有手机情况下度过了当年的圣诞节和跨年夜。这原本是每年社交最频繁的时节，我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感到恐慌，担心有太多朋友要见而时间却不够用。没有手机，社交媒体就不会提醒我在那些没去成的聚会上错失了什么。因为处于“失联”状态，所以我也不会收到别人匆忙发来的邀约。

到别人匆忙发来的邀约。

这真是我这些年度过的最安静的假期了。

当我终于买了新手机，重新开始使用社交媒体，我觉得自己拥有了新的力量。我无需通过这些社交平台让自己觉得“酷”。我想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样“正确使用”社交媒体，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自卑。我渴望克服自卑，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和性格，决定了我整个人生走向。

我并不感到遗憾，但我以后再也不会受到过去自卑感的摆布。

我终于认清了互联网的本质。它不是我要去追赶的列车，不是我要打赢的战争，也不是我拼命想要挤进去的某个高端俱乐部，而是一部让生活保持均衡的调节器。它像一个开放的游乐场，也像一片浩瀚的信息海洋，无穷无尽。但它本质上是工具——只在我需要的时候才会去使用的工具。

从短视频开始思考

姓名：陈穆

年龄：27岁

职业：摄影师

出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现居地：上海市



无论在何种时代，新的媒体之兴起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以下是我们家的周末——祖父在看报纸，祖母在听收音机，父亲在浏览网页，母亲在看电子书，而我在刷抖音、快手和微博短视频。

这大概也是许多家庭的周末。当然，这也是媒体发展的一片小小缩影。

无论在何种时代，新的媒体之兴起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传统的媒体还未消亡，新的媒体已经层出不穷，我们已然置身一个万物皆媒的世界，甚至仿佛就连新媒体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也许对于传统的书刊报纸而言，电子书和网站已经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而现如今，电视、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人们的关注从传统的报纸和广播上迅速转移，从文字阅读时代进入了图片阅读时代，并且即将一或者正在一从图片阅读时代进入视频阅读时代。

韩寒在《碎片》中写道，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爆，话题越来越杂，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多睡几

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就要被人类抛弃了。短视频的出现使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时尚化、趣味化和多元化，但同时，也更加碎片化、速度化和娱乐化。各式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如雨后春笋，成为网红、主播、up主等几乎零门槛，也使得网络上的视频内容爆炸式增长。诚然，对待新事物，我们应当以乐观和宽容的态度去尝试和接受，但现阶段，短视频发展仍然不尽完善，许多热门的短视频内容都是无意义的恶搞、跟风 and 作秀，甚至还打出擦边球，只为赚取看客目光，享受所谓的“走红”快感。而同样糟糕的是，看客们也欣然接受这些短视频内容，甚至成瘾，并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刷视频上。

尽管客观来讲，步入视频阅读时代无疑是一种媒体发展下的前进，但当看客们在不知不觉中将阅读时间献给了大

多无用的短视频时，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前进并没有为我们带来更多实质性的进步。希望在短视频从上升期进入稳定发展期之后，能够更加规范、积极、有意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毕竟，新媒体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新”，而在于它能为我

们带来什么。

在未来，当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当视频阅读时代成为进行时，当人工智能等科技的使用领域更加广阔时，下一个新媒体潮流又将会是什么？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新媒体自身的更迭和推陈出新早晚会将

新的潮流带到我们面前。也许在数年以后，在某个我举着手机刷着抖音、快手和微博短视频的周末，我的儿子一脸嫌弃地看了看我，然后戴上了VR眼镜，继续沉浸在时下最新潮的可以参与剧情发展与结局走向的互动式电影中。

最大程度地做“减法”

姓名：Ankit Chawla
年龄：23岁
职业：科技记者
出生地：印度新德里
现居地：印度新德里



互联网为许多个“他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大门。

2018年，社交媒体尽管被一些人视为“恶魔”，但在生活中却几乎每个人都离不开它。在过去的十年里，脸书和推特等社交网络平台迅速崛起。这些平台掌控了每个人的社交生活。人们不停地寻求得到朋友和陌生人的认可，将生活变成了一场看似精彩飞扬的舞台剧。

社交平台存在着消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迫使我们变成了演员。但与此同时，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道通往新职业的大门。至少对我而言，它们做到了这一点。

早在2015年，我就创建了自己的个人科技媒体博客，并尝试使用流行的小工具，满足我对写作的渴望。我通过社交媒体同合适的媒体和公关人员建立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扩大自己博客的影响力。通过网友的推荐，我开始在多家公司从事自由职业。随着互联网普及率提升，我的职业维度也在不断扩大。

事实上，我做的最长久的是一份写作工作就涉及通过推送脸书广告来增加网站流量。这段经历使我彻底掌握了社交媒体的业务。事实上，脸书一直在遏制原生内容，而是热衷于推送付费企业的帖子。这便是一个大型社交平台影响用户所接收的信息、时机和来源的例子。关于这一做法，我们已经从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不当利用脸书用户个人信息从而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选情的丑闻中窥见一斑。

只有当人们了解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它才能成为

一种创造价值的方式。我认识的许多人因担心不够合群而感到焦虑，甚至濒临崩溃。他们试图阅读社交媒体提供的所有信息。他们还努力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情况可能大相径庭。

长达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使用社交媒体时应最大程度地做“减法”，关注重要的事情或是有价值的信息。这才是使用这些在线平台的最佳方式。2008年在校期间，我在社交网站Orkut注册了账号，这是我首次接触社交媒体。它瞬间改变了我在学校里的社交圈。

在学校里，很多从未在现实生活中有过交流过的同学都成了我在网上聊天的对象。我和许多人一道，过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是线下的，另一种是在社交媒体上。然而，当我从高中毕业后，我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求摆脱这种习惯。

对于监控公司来说，看似永久的网上行为记录可能会有很大用处，但对人际交往而言，这却并非是一件好事。讽刺的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等影响力与日俱增

的社交媒体平台，均为同一家公司所有。在与家人、朋友和伙伴的来往中，我们的亲密互动、团聚甚至争吵的情形都被这些平台记录了。

这些日志可能未来成为证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演变为社会热点。然而，从积极的层面来说，它们也可以记录过去，从而审视自身的变化。

总而言之，可以说我的职业生涯是在互联网上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作为撰稿人还是进行股票交易，我

获取的每一分收入，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互联网上赚来的。不仅仅是对于我，互联网为许多“他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大门。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均衡器”。以YouTube为例，个人视频博主一直是使其成为全球最大视频网站的主要推动力。

我关注了一位印度YouTube旅游博主的视频内容。他以极低的开销独自前往其他国家。他会以一种实用而

质朴的方式，上传让我产生共鸣的内容，因为他说的是生活中的话语，表现的是一个普通旅行者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很快，他在YouTube上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可能正是因此，他辞去了坐班的工作，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全职旅行中。还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辞去了单调乏味的工作，在互联网上开辟新的领域，因为在网上，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今，这类专业人才已经遍布各行各业。

传统媒体如何 “活”在当下

姓名：周世雄

年龄：25岁

职业：央视网记者

出生地：江苏省

现居地：北京市



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存在绝非苟活，而是必需。

新媒体技术的进步，衍生出许多新型产物。随着直播行业等自媒体领域的迅猛发展，受众的身份不再只是传统媒体之下

“手无缚鸡之力”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借助新媒介之力，获得了话语主动权，摇身一变成了信息的传播者甚至是生产者。

然而，在鱼龙混杂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可以直言心中的观点与想法，但也可能成为负能量和虚假信息的传播者；而网红的泛滥也使明星效应呈现“变态”膨胀，导致自媒体的娱乐性质过分夸大，一度出现“新闻大事无人问，网红娱乐漫天飞”的现象。这并不是新媒体自身的弊端，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媒介使用权的“泛滥”和传播体系的“崩盘”，对媒体的大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下，传统媒体的存在才愈加被证明是必要的，是应当被扶持和关注的。当新媒体带来的不仅是形式的“新”，还有底线的“新”，那么就需要传统媒体凭借着最后信仰和力气，坚持发出人民最需要的声音。

有人说，如今的传统媒体，凭借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市场大环境中处于一种“名存实未亡”的余生地位。如果维持现状，它们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像所有的生命一样，终有一天走向消亡，尚且无人能给出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统媒体该如何发声，如何力挽狂澜，如何与“乱象”抗衡对搏、传递正能量和“硬”新闻，不仅仅只是依靠传统媒体人的一腔热忱。

正如俗话说，“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如果能以传统媒体的内容强势搭配新媒体的速度和覆盖面优势，以新潮的形式满足受众需求，以踏实的态度做到真实、公正、及时、全面，一定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候。到那时，“硬”新闻的价值会得以彰显，传统媒体会以另一种形态获得新生；而自媒体在规范化和正向引导下，也能够焕发新的活力。■

“非异化”生活的可能性

图文 / 凌敏

如果只从市容市貌来推测一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可能是错的，甚至错得离谱。

2018年年底，我飞往印度科钦参加了国际双年展协会年会。科钦是位于印度西南部的港口城市，那里正在举办双年展，所以年会也选择在那里召开。在科钦的几天，我参观了科钦双年展的大部分展馆，同时走进巷弄和海港，穿梭于不同空间之内，除了疑惑、感叹，更多的是我对科钦双年展主题的思考。

本届科钦双年展旨在探讨“非异化生活的可能性”。什么是“非异化”？这要从“异化”说起。在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异化是指客体对主体的分离与敌对。就人而言，是指人的生产及产品反过来对人形成的压迫。换句话说，人本来是主人，是劳动、工具、产品的主人，但结果刚好相反，人失去了自由，成了劳动生产和工具产品的奴隶，这就是异化的过程和结果。尤其在工业社会和资本环境下，人的异化非常明显。

策展人安妮塔认为，非异化的世界是一个相互拥抱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和别人一起享受智慧与美丽，不需要把“他人”当成敌人，能感受到彼此的联系。在她看来，现实



印度观众观赏中国艺术家宋冬的作品《水庙》。

世界是有敌意的。如果我们想在地球上过得更好，就必须以谦卑的态度拒绝为资本服务。

为此，她构想以“非异化生活”为诉求，将本届双年展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展览，将同步的、有影响的、有现实性的作品组合成拥有不同思想色彩的交响乐呈现给大家。另一部分是营造一个随意而有力度的对话空间，在那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策展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而关于非异化生活的可能性，可

以在这种没有权威的对话中发问并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

也许是因为语境关系，也许是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不够，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安妮塔的想法，对这届双年展的主题也心存疑问。同时，科钦这个城市也让我感到迷惑。科钦是个拥有五百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乃至中国船队都来过这里，但目前这座城市的简陋与它厚重的历史并不匹配：窄窄

的沙土路、低矮的平房、原生态模样的海滩……

不过，如果只从市容市貌来推测一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可能是错的，甚至错得离谱。本届科钦双年展上展示的作品以及主办方推出的互动交流活 动，独特而丰富，尤其是地域特色和当地人的参与态度，以及紧紧将现实生活和作品联结在一起的做法，还有对当代艺术的独到理解，都让人忍不住惊叹。

科钦双年展是印度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今年是第四届，每一届都有不同主题。首届双年展举办之后，工作团队很快意识到只展示国际艺术是不够的。他们决定用一种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当地的居民和观众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要在双年展的印度化方面下功夫。

所以从第三届开始，他们举办了一个平行的学生双年展，作为科钦双年展的组成部分。这个学生双年展还延伸到南亚各地的艺术学院，鼓励年轻艺术家反思他们的实践，利用全球双年展平台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提高曝光度，为艺术学校和艺术生产注入活力。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本届科钦双年展上，我们从不少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了奇思妙想和具有印度特色的创造力。

本届科钦双年展在空间上的分布不仅包括科钦，也扩展到了穆兹里斯地区以及周边岛屿。因此它的全称是“科钦-穆



2018年科钦-穆兹里斯双年展作品。

兹里斯(Kochi-Muziris)双年展”。据科钦双年展基金会介绍，科钦是印度少数几个前殖民时期多元文化传统继续蓬勃发展的城市之一。这些传统可追溯到穆兹里斯这座在14世纪被一场洪水掩埋的古城。该古城遗址前两年被发现，目前正在挖掘中。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并检视过去，提出一种根植于印度经验的新美学。

所以，基金会方面表示，科钦-穆兹里斯双年展意在创造一种世界主义和现代性的新语言。这种语言植根于科钦这个古老的贸易港口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样的办展思路，他们把很多展场设置在现有的建筑物、公共空间和历史遗迹中，包括一些弃而不用但藏有故事的旧工场、旧机构和遗址建筑，甚至是一些民居和巷弄，就连一些断壁残垣也成为布展的地方。而最为可贵的是不少作品是跟那个有故事的场地高度相关的，抑或是根据那个现场来创作的。这样的作品自然会让当地民众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在与历史和传统链接的同时也带有浓烈的当代色彩。

安妮塔不仅以博爱的情怀细致地论述了“非异化生活的可能性”，更在她的策展安排中将这种情怀变现为对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比如，在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有半数以上是女性，而在总体安排上，除展览外，双年展还为学龄儿童和所有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讲座、研讨会、影片放映、音乐演出、讲习班和教育活 动。

在回程飞机上，我细细阅读了从科钦带回来的文字材料，渐渐理解了科钦双年展基金会的用意和策展人安妮塔的诉愿，他们是要通过举办双年展这个国际平台，向内传递世界风，向外呈现印度美，呈现非异化生活在印度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国很多举办展览的场地设施新颖豪华，国际大牌云集，但对自我的呈现又怎样呢？是不是有点“脱离民众”？特别是对公众，对学生的艺术教育又是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值得深思。



与科钦双年展平行的学生双年展中的作品。

本文作者凌敏为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国际艺术评论协会副主席，国际双年展协会会员。



“读懂中国”系列丛书

外文出版社

崛起在世界的地平线

文 / 朱民

1978年，中国除了有居世界第一的9.6亿人口外，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让中国人有饭吃是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开放。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开端，城市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相继开展；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加入WTO……从此，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有无数专著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绩和经验，但大多是比较中国自身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的发展。本书另辟蹊径，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视野下，除观察和比较中国经济金融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外，还从世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在这段时间国际地位的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除牛奶外，现今中国农畜产品人均占有量都从1978年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中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中国的粮食生产还为全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用不到全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了全世界1/4的粮食，养活了占全世界近1/5的人口。

中国的工业和城市经济改革同样精彩纷呈。199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3.64%，2010年中国就以1.955万亿美元的产值及19.8%的世界占比领先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年，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84万亿美元，已是美国和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之和。

再看居民生活，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自古有句俗语叫“民以食为天”，但在1978年前能吃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肉食消费从严重稀缺走向世界消费水平，1982年超过了非洲水平，1997年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达到人均每年61公斤，比世界水平高42%。水果从“奢侈品”变成日常食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均每年水果消费量长期都不足10公斤，而非洲是中国10倍的消费量水平。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

“有教无类”的思想。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仍有超过一半的适龄人口没有接受相应的中等教育。到2015年，中国小学、初中毛入学率均已超过100%，达到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同时加大了对初等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

这确实是震撼世界的变化。经济改革与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的经济是富有活力的强大的发展经济。正是因为这些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头雄狮开始醒来。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和开放之旅，她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从一个占世界经济微不足道的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崛起在世界的地平线，前景无可限量。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执行董事。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是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



沟通中印



关注我们的
多媒体平台



联系我们: contact@chinaindiadialogue.com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人民画报

中文刊《人民画报》



大国脸谱 人民记忆 中国情感 世界胸怀

加入我们 为中国代言

印度版《中印对话》



俄文刊《中国》



英文刊《中国画报》



韩文刊《中国》



中亚版《丝路瞭望》



广告垂询热线：010-68412370 / 88417408

《人民画报》微信公众号

